

江藩 方東樹著

漢學師承記（外二種）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主編 錢鍾書

執行主編 朱維鈞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鈺·徐洪興 編校

漢學師承記
(外二種)

江藩 方東樹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漢學師承記(外二種)/(清)江藩等著. - 北京:生活·讀書·
新知三聯書店, 1998.6
(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/錢鍾書主編)
ISBN 7-108-01144-1

I. 漢… II. 江… III. 漢學-研究-中國-清代-文集 IV.
K207.8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98) 第 16015 號

漢學師承記(外二種)			著 者			江 藩			責任編輯			潘振平			封扉設計			寧成春			版式設計			陸智昌					
出版發行			生活·讀書·新知			三聯書店			(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)			郵 編			一〇〇〇一〇			經 銷			新華書店			印刷			北京新華印刷廠		
版 次			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			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			六三五×九六〇毫米十六開			三 千 冊			三十五萬五千字			印 張			三十四·六二五			定 價			四十八元		

本書收入江藩的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國朝宋學淵源記》和方東樹的《漢學商兌》。三書均成於十九世紀初葉，江氏的兩種著作，為清代學術史的總結性作品，在晚清乃至近代學界有著長久的影響；方氏攻訐漢學的著作，頗具代表性，在同光年間曾一印再印，故一併收入，以供參閱。

漢學師承記（外二種）	江 藩	方東樹著
書目答問二種		張之洞著
毀園文新編		王 韜著
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	郭嵩燾 薛福成	劉錫鴻 宋育仁 著
東塾讀書記（外一種）		陳 澧著
萬國公報文選		
新學僞經考		康有為著
旭書 初刻本 重訂本		章炳麟著
康有為大同論二種		康有為著
劉師培辛亥前文選		劉師培著

編者說明

《中國近代學術名著》的晚清編，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，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。

遴選的學者和論著，着眼於學說有新意，有己見，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，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。

結集則不拘一格，以專題為主，每種或收一人一書，或輯一人多篇，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。

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：選擇底本，取原校較精的刊本；異本互勘，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；覆核引文，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；重施標點，包括分段；編製索引，分人名、書名兩類。

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，附於篇前。導言既重可讀性，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；也重學術性，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。為行文簡明，諸導言凡引證出處、攷訂史實或商榷

疑義，均以附注形式陳述。

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，晚清編擬分輯刊行，初定每輯十種，先成先印。如可按設想出齊，當能略見系統性。

這套選編，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，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。編輯設想、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，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，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鈺組織實施。

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，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。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，由於種種緣故，長期不克面世。現由北京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。

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，同時期待高明指正。

編例

一、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，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：

底本。以原刊為主，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。

校勘。正底本排校舛誤，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，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。一般不作理校。

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，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，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。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，於正文不作改動。

節錄。於篇題下注明，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。

標點。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，概施以新式標點。

分段。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，以便讀者。

注釋。作者原注概從原刊。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謬誤，以頂注出之。

譯名。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。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譌誤，則由編者逕予改正。為方便閱讀，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。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。

版式。概用繁體字，直排式。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，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，均改為通行繁體字。原作或有雙行夾注，現均改為單行夾注。

索引。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、書名兩種索引，以便通檢。

二、本叢書所選諸種，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，予以保留，並移作附錄。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導言

壹

公元一八一八年，當清嘉慶二十三年，旅居廣州的江蘇甘泉的老名士江藩，刻成了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八卷，後附《國朝經師經義目錄》。那時他正在兩廣總督阮元的幕府中，參與《皇清經解》的編纂策劃，被阮元引為堪總其事的海內二三學友之一。因而阮元不僅資助江藩刊行《漢學師承記》，還作序盛推此書，說是「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，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，大義微言，不乖不絕，而二氏之說，亦不攻自破矣。」【一】

四年以後，清道光二年冬末（一八二三年初），江藩又在廣州刊印《國朝宋學淵源記》二卷，「附記」一卷。這回作序者署名「長白達三」，自然是滿洲旗人，時官居廣東鹽運使，無疑也是資助此書出版者。達三在序中又盛推此書，「無分別門戶之見，無好名爭勝之心，唯錄本朝潛心理學，而未經表見於世者。其餘廟堂諸公，以有國史可考，不敢僭議也。其用心至矣！其用力勤矣！」【二】是這樣嗎？倘說阮元序前書，對於他這位以狂放著稱的小同鄉兼老同學的推崇，還有分寸的話，那麼達三序後書，則簡直在瞎捧，表明他或他的捉刀人，似乎從未讀過前書，也似乎沒有看懂

後書。

《漢學師承記》至遲在一八一二年已有初稿。這年也是江藩同鄉的汪喜孫為此書作跋尾，便強調這位長輩著書的本意，在於區別漢宋門戶，並把宗理學的古文名家汪琬、方苞，對漢儒宋儒譏彈的毛奇齡，自命為漢宋調人的王懋竑，都斥作「矯誣之學」，「惡莠亂苗，似是而非」。【三】一八一七年，龔自珍致江藩函，建議他把書名改作《國朝經學師承記》，說是原著「漢學師承」，「名目有十不安」，其中批評的重點，便是江藩有「門戶之見」【四】。至於《宋學淵源記》，聲稱凡做過官的都不著錄，「以有國史可考」云云，更是飾辭。一瞥他在前論後記列舉的所謂國史有傳或「自必有傳」、「無煩記錄」的人物，唯獨遺忘了自居為深得「正學」心傳的桐城諸人，方苞、劉大櫟、姚範、姚鼐等，便知他的真意所在。

桐城派早與漢學家結怨。尤其是此派中堅姚鼐，在乾隆間任四庫館臣時，曾屈尊要求拜皖派大師戴震為「夫子」，遭到戴震遜辭堅拒，在學林大失面子，終身切齒，所撰《惜抱軒尺牘》等多收痛詆戴震和考據學的文字。【五】江藩書出時，姚鼐已死，他的四大門徒俱在。其中最好鬪的是桐城老諸生方東樹。

方東樹少江藩十一歲，身份與監生江藩相同，而且都終身不得一舉。但江藩在青年時便因注釋乾隆帝的「御製詩」而曾獲得預備召見的殊榮【六】，從此「以布衣為掌故宗」【七】，備受達官名宿的禮敬。而方東樹雖以姚鼐弟子的緣故，奔走權門，未受白眼【八】，但僅充食客而已。阮元在廣州開學海堂，提倡「以古學造士」【九】，也藉以安置投奔他的海內學者文士。方東樹也廁身

其中，得以目擊江藩二書刊行並首先在阮元幕中引起的轟動效應。倘說《漢學師承記》獲阮元推崇，已引出方東樹的妒火的話，那麼《宋學淵源記》的繼刊，引出的便是他的怒火。【一〇】這不難理解。試想，假如江藩將桐城諸老擯斥於「國朝宋學」之外的策略奏效，那麼方東樹輩自命「正學」而藉以為官作幕的「謀食」術，豈不從此失靈？誰都知道，中世紀晚期熱中於趨附權貴的所謂道學夫子，早如顧炎武所譏，把「知恥」置諸度外，他們最痛恨的是有人染指其飯碗。何況江藩此書意在砸掉其飯碗。於是方東樹感到忍無可忍，決意寫一部書，不顧江藩著書已是針對姚鼐罵倒「樸學」的回應這一事實，更反噬其著書目的「以闢宋儒、攻朱子為本」【一一】。這就是後人熟悉的所謂「上綱」。既然帝國的聖祖、世宗、高宗都已明白宣佈孔孟之道為綱，而朱熹關於「綱常」的解釋，乃是衡量是否恪守孔孟之道的唯一尺度，那麼誰被譴責為「闢宋儒、攻朱子為本」，誰就等於自尋死路。方東樹如此嚴厲譴責江藩，不待說也在嚴厲譴責阮元。依清律，假如他控告江藩「攻朱子」的罪名得以成立，則曾替江書作序並引為知己的阮元，至少也得承受「姑息養奸」的咎責。但不知為甚麼，方東樹寫成此書，並將它獻給阮元，已在《宋學淵源記》刊行三年之後，恰值阮元奉調離粵赴雲貴總督任之際【一二】，彷彿他有意以此書替阮元變相左遷送行。這部書，就是《漢學商兌》。

恕我寡聞，至今沒有見到《漢學商兌》的道光丙戌（一八二六）初刻本。我所見的此書最早版本，是道光辛卯（一八三一）冬的重刊本。江藩已在去歲死去。阮元仍在雲南受反清的「野人」困擾。這時方東樹已回到合肥依附安徽巡撫鄧廷楨。鄧廷楨號稱「續學好士，幕府多名流」【一三】，

其實沒甚麼學問，附庸風雅而已。那時方東樹虛齡六十，在故鄉已入桐城派活着的耆老之流，因而在此書「重序」中，攻擊「近世為漢學者」越發沒有顧忌。【一四】

同江藩一樣，方東樹也沒有想到，他們從正負兩面評論清代漢學，主觀意向都在於「打擊別人，擡高自己」，結果卻殊途同歸，恰好從兩個極端，凸顯了所謂漢學和所謂宋學，早在十九世紀初葉，早在「歐風美雨」大舉從海上侵襲帝國大陸前多年，便都已走向末路。他們其實是用極不諧和的音調，給中世紀式的「清學」，共同譜寫了輓歌。

貳

甘泉是清代揚州府治的屬縣之一。清中葉的揚州，仍然是江南最為繁華的商業城市。這裏是帝國的鹽務重心、漕運要津。畸型的鹽業壟斷政策，使這裏成為帝國政府的財源和包稅鹽商的利藪。而地處南北交通運輸命脈的運河中段的起點，又使這裏成為北往南來的商人、士人和官員等必駐都會。但它又不是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的駐在地，即不是地區的政治中心，因而較諸南京、蘇州，受帝國和地區的軍事化的政治控制，相對來說都較弱。因而由中世紀式的經濟繁榮，帶來的文化繁榮，在這裏也表現得頗具典型色彩。紳商輻湊，巨賈雲集，既使這裏的消費需求猛增，也使這裏的消閑文化俗雅並舉。在十八世紀，揚州便出藝妓，出名伶，出畫家，出詩人，出書賈，出文士，也出學者。依靠食鹽專賣而大發橫財的帝國稅務官和包稅商，出於迎合皇帝假充斯文或改良自身貪婪形象的複雜心態，每每延聘名流學者充當清客，或資助刊行自己莫名其妙的學術著作。在乾隆時

兩度任兩淮都轉鹽運使的盧見曾，雖在初任內曾因貪污被告發，而連累兒女親家紀昀一道被充軍，但復任十年內，卻變本加厲，建書院，刻經書，在府中供養眾多名士，包括吳皖兩派漢學家宗師惠棟、戴震等，遂使「談藝者無不知有雅雨先生也」【一五】。這就是一則顯例。

有財務作後援，有學術信息活躍作前提，又有少受政治干預作酵母，因而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，清代漢學中崛起自成特色的揚州學派，便是順理成章的。

所謂揚州學派，空間涵蓋面當然包括那時的揚州府所轄各州縣學者。但著名學者，都出在揚州府治所在的甘泉、江都二縣，及其北邊的高郵州、寶應縣，以及南邊的儀徵縣。這五城都位於大運河畔。原籍江都的汪中、汪喜孫父子和凌曙，甘泉的焦循、焦廷琥父子和江藩，高郵的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和李惇、賈田祖，寶應的劉台拱、劉寶楠伯姪，儀徵的阮元和劉文淇、劉毓崧父子等，便是乾嘉間揚州學派的佼佼者。但追溯他們的學術傳承，多半非戴震即惠棟。再深究呢？卻又發現他們雖然個人風格差異很大，有的謹慎，有的狂放，有的專經，有的求通，有的宣稱志在復古，有的不諱愛好「西學」，但不論是行迹怪誕的汪中，居鄉橫暴的焦循，曾為傭保的凌曙，致身公卿的二王，以及餘人，在學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非宋非漢趨向。這一趨向到曾任九省疆臣的阮元尤為明顯。他是漢學家，但隨着主持各省的教育、行政和大區軍民政務的閱歷日增，就越發傾向於調和漢宋。

我曾經指出，十八世紀的學術史中的所謂漢宋之爭，原是清統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產物。【一六】建立在一個少數民族壓迫漢族和各民族的特權基礎上的清帝國，它的最高權力控制者

對漢文化傳統的認知愈深，便對本族漢化的擔憂愈甚。否則便很難理解，到乾隆帝即位，上距清建國已逾百年，在其祖父康熙帝在位時還極力拉攏的故明遺老遺少早已死光，而他厲行滿漢隔離政策，反而超過以猜疑並從而建立遍佈各省的特務網著稱的其父雍正帝。從康熙到乾隆，祖孫三代總共君臨中國一百十八年，尤以乾隆帝統治的六十四年，分裂漢文化的政策最為露骨。一方面繼續承認所謂朱子學是帝國統治思想的理論基石，一方面又鼓勵所謂漢學家「兩耳不聞窗外事」的沈湎經史考證的風尚。時時譏嘲假道學，但自命朱熹信徒的又致身通顯，往往表彰真漢學，但偶而賞給戴震以進士頭銜，同時嚴懲敢於上書籲求用人泯除滿漢界限的杭世駿，命其在罷官後「奉旨買賣破銅爛鐵」；這就是乾隆帝自以為得計的馭漢之術。他的繼承人嘉慶帝對此遵而勿失，可惜玩弄權術遠遜於乃祖乃父。剛親政便使王念孫獲得首勳和坤的榮名，卻又使洪亮吉獲得忠君得咎的盛名。他以此顯示朝廷已沒有能力繼續先帝的分裂漢文化的政策。於是阮元以疆臣身份欲充漢宋調人的策略，直接回應是失敗。失敗不在別處，就在他的幕府內。

在就任兩廣總督前，在主持浙江省政任內，阮元已奉旨修成《國史儒林傳》。其中已明白表露，他以黃宗義、顧炎武作為清朝漢宋兩大派的共同開山，意指說理學當宗黃，說經學當宗顧，而黃、顧曾互相稱道，則後繼者不必爭孰是孰非。豈知首先惹惱了他的「同里同學」江藩。此人早有「狂生」名，總在大庭廣眾自讚「文無八家氣」【一七】。他既然連韓柳歐蘇輩都不放在眼裏，怎能想像他會由於寄身昔日學友籬下而附和其學術史見解？寫定於阮元幕中並由阮元作序的《漢學師承記》，何以那樣強調清學史的漢宋分野，乃至於清學大宗師顧炎武、黃宗義，也被判作「以不純

宗漢學」，而置於編末，很可能是在故作違言。

叁

《漢學師承記》的編纂採用傳記體。全書八卷，正傳四十人，附傳十七人，但附傳中有若干人不登於目錄。

首卷先述中國經學的歷史概貌，類似全書總序。然而述三代祇虛讀學校教育，矢口不提韓愈的那個「道統」。自漢興轉入實述，而以為「古學」至東漢末的鄭玄已臻於至善，那以後便是一連串的破壞過程，到明代更墮入昏天黑地的狀態。多虧「我」大清列皇個個聖明，代代相承，終於「文明於變」，重現盛世。在不辭辛苦地對順治到嘉慶五帝逐一作了極口讚頌之後，江藩說出了堪稱全書主旨的一段話。據說這來自乃師余蕭客、江聲的教誨，「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，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；元明以來，此道益晦。至本朝三惠之學，盛於吳中，江永戴震諸君，繼起於歙，從此漢學昌明，千載沉霾，一朝復旦！」

奇怪的是江藩在前述末宣稱，「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，山林則兼誌高風」，表白他的詮次重點在於困居草澤的漢學家，但就在首卷，列入正傳第一人的，卻是閻若璩。

的確，閻若璩的《古文尚書疏證》，在清代對偽古文《尚書》作出了一審判決，那以後經過惠棟、王鳴盛等的相繼考證，使此書之偽，基本定讞。但他不是顧炎武的門徒嗎？他不是吳棫、朱熹、梅鷟等宋明學者的研究基礎上纔能判決此書之偽嗎？為甚麼在清初流亡草澤的顧炎武反被打入

另冊，而與道學藕斷絲連的閻若璩，卻被尊為清代漢學的開山呢？其實本傳已自透其底。江藩津津樂道的，是閻氏在康熙間怎樣被達官賞識，尤其怎樣被未來的世宗憲皇帝優禮。雖在傳末帶了一筆，說此人有背師嫌疑，但全傳基調是稱道閻氏同清初統治者的積極合作精神，則是分明可見的。相形之下，黃宗羲自高身份「將俟虜之下問」【一八】，顧炎武標榜氣節卻往來於致身清朝顯貴的外甥三徐之門，在江藩看來都有悖於孔門傳統。因而他懷疑閻若璩背師，未必是貶意。【一九】

由這個例證，可知江藩同情有學問而常在底層的漢學家，並非讚美他們自甘淡泊，為學術獻身，而是哀憫他們「數乖運舛」，「簞仕無門」，雖通經而無以致用。清代的漢學家，無論是古文學者還是今文學者，大抵都是漢儒的「通經致用」說的近代門徒。正如周子同師所譏，他們「對於西漢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，愚而且誣地在讚嘆着做做者」【二〇】。江藩的言論，表明他也屬於「真有點非愚即妄」者流。不過這一點可以諒解，因為他百年後，所謂學術與政治的關係，仍然時時來纏不清。

江藩把「三惠之學」說成清代漢學昌明的標幟，也近於誇張。所謂三惠，祖父惠周惕說經未脫頭巾氣，受媚俗成名的朱彝尊稱道。其子惠士奇以八股晉身，被雍正帝欽點廣東學政，目睹嶺南文士的蠢愚無知，忽然想到可以模擬漢代在蜀郡興學成名的文翁，由此獲得大名，但雍正帝在他離粵後罰他用私產重修鎮江城，可見皇帝已疑心他在廣東六年橫財之多。他著有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三「說」，號稱「邃深經術」，但三書沒有超出平凡之上。在經學上真有造詣的，是終身為縣學生員的孫兒惠棟。他的《周易述》、《古文尚書考》、《春秋左傳補注》、《九經古義》諸書，